



真理报

第八期

2025年11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打倒修正主义！人民斗争万岁！

劳动解放社，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

《关于工商业政策》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时事评述

- ★ 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与修正主义问题论析 1-4
- ★ “勇敢追梦”抑或资本枷锁？——马列毛主义视角下对央视美团短片的强烈批判 5-8
- ★ 论吸毒记录的封存 9-10
- ★ 以阶级斗争为纲：石家庄外卖员持刀反击事件评述 11-15
- ★ 英国科尔宾新党成立的马列毛主义评析 16-17

百家争鸣

- ★ 小资产阶级性——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剖析 18-20

不周山下

- ★ 法西斯的印度必将被摧毁；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胜利！——土耳其工农解放军指挥部（TKP-ML TIKKO） 21-22
- ★ 菲律宾青年和学生再次举行反腐败抗议 23

历史文献

-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4-25

导师语录

26



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与修正主义问题论析

引言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公共屋邨发生了一场震惊全港的“五级”大火。大火迅速蔓延至该屋苑8座大楼中的7座，燃烧时间超过43小时。截至目前，这场灾难已造成至少156人死亡、约79人受伤，超过30人失踪，是香港数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火灾之一。惨剧发生后，香港社会陷入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人们自发前往火灾现场悼念遇难者，献上鲜花，祈愿逝者安息。然而，在悲痛之余，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本文将马列毛主义和强硬反修正主义的立场，对宏福苑大火的背景和后续进行分析，揭示这场悲剧背后修正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治理结构问题、资本利益侵蚀和对工人群众安全的漠视等现象，并结合历史经验提出反修正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未来斗争方向。

事件背景

火灾经过与损失：2025年11月26日14时51分左右，有路人首先发现宏福苑住宅楼外墙的竹制棚架防护网起火。由于大厦外墙正在进行大型维修施工，窗户几乎都被发泡胶密封，而脚手架上覆盖的尼龙防护网又不具阻燃性能。起火后，火苗沿着易燃的防护网和发泡胶迅速蔓延，火势以异常的速度从起火点所在的宏昌阁扩散到其余六栋相连楼宇。高温导致窗户玻璃爆裂，火舌很快侵入楼内，酿成全面灾难。消防部门奋战两昼夜才于11月28日清晨基本扑灭大火。这场大火吞噬了上百条生命——遇难者包括普通居民、建筑工人和家中外籍佣工，甚至还有一名英勇殉职的消防员。许多遇难者被发现倒毙在楼梯间或天台上，显见他们在弥留之际曾拼力向外逃生却终究未能脱困。此外，约79人受伤送医，数千名居民无家可归，7栋高楼近2000户住宅几乎全部烧毁，直接财产损失和生计冲击难以估量。

事件背景

火灾经过与损失：2025年11月26日14时51分左右，有路人首先发现宏福苑住宅楼外墙的竹制棚架防护网起火。由于大厦外墙正在进行大型维修施工，窗户几乎都被发泡胶密封，而脚手架上覆盖的尼龙防护网又不具阻燃性能。起火后，火苗沿着易燃的防护网和发泡胶迅速蔓延，火势以异常的速度从起火点所在的宏昌阁扩散到其余六栋相连楼宇。高温导致窗户玻璃爆裂，火舌很快侵入楼内，酿成全面灾难。消防部门奋战两昼夜才于11月28日清晨基本扑灭大火。这场大火吞噬了上百条生命——遇难者包括普通居民、建筑工人和家中外籍佣工，甚至还有一名英勇殉职的消防员。许多遇难者被发现倒毙在楼梯间或天台上，显见他们在弥留之际曾拼力向外逃生却终究未能脱困。此外，约79人受伤送医，数千名居民无家可归，7栋高楼近2000户住宅几乎全部烧毁，直接财产损失和生计冲击难以估量。

起火原因调查：根据事后调查，起火源头可能是一支香烟火星或电气火花点燃了棚架外围的绿色防护网，而该防护网材质未达阻燃标准，在风势作用下火苗沿棚架迅速攀升。更致命的是，大楼窗户为施工方便被发泡胶板封死，这种保丽龙材料高度易燃，助长了火势从外墙向每户室内蔓延。消防处指出，大火之所以难以控制，主要就在于棚架防护网和封窗发泡胶均属易燃品，使得火焰以几乎无法阻挡的速度在高层建筑之间借风势延烧。本应起到阻隔火情的建筑材料反而成为助燃剂，凸显出施工材料安全监管的严重漏洞。

政府和社会反应：火灾发生后，香港特区政府启动紧急应变机制，警方、消防、民政等多部门联动展开救援。在政府协调下，附近社区会堂、体育馆等迅速改作临时庇护中心，安置疏散居民；多家医院开设专柜接待伤者和家属。特首李家超宣布设立专项援助基金，注资3亿港元并接受社会捐款，用于赈灾和灾民救济，每户灾民获得紧急补助及后续生活津贴。截至12月初，社会各界捐款总额高达23亿港元。与此同时，大批热心市民、公益团体和商界人士也纷纷自发行动，捐赠衣物、食品和日用品，协助受灾居民渡过难关。

然而，随着救援展开和真相浮出，公众舆论对政府部门和施工单位的质疑与批评也不断升高。部分市民和社会组织发起成立“宏福苑火灾关注组”，在网上联署提出“四大诉求”，要求政府持续支援灾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潜在利益输送和监管失职、杜绝以找替罪羊草草结案、严肃追究相关官员责任。短短数日，联署签名过万，足见民间要求问责的呼声之高。香港舆论普遍关心：这场大火本可以避免吗？究竟是纯粹意外，还是有人祸使然？政府在监管和应对上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这些疑问为进一步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此次事件埋下伏笔。

理论分析：修正主义在事件中的体现

宏福苑大火表面上是一起意外灾难，但从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来看，背后折射出一系列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制度性问题。特别是香港特区政府在城市治理中表现出的某些倾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批判的修正主义不谋而合。所谓修正主义，是指在理论或实践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思潮。“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往往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口头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奉行的是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混进党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掌权就会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从此次火灾的教训看，香港现有治理结构中正存在着向资产阶级利益倾斜的危险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治理结构的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倾向：马列毛主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路线，要求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然而在宏福苑事件中，我们看到有关部门漠视基层呼声、官僚作风严重的问题。早在2024年9月，就有宏福苑居民向劳工处投诉施工使用的棚架围网可能不阻燃，担心存在火灾隐患。但劳工处竟回复称宏福苑“发生火灾的风险相对为低”，并以没有明火作业为由对此隐患置之不理。后来有专业人士和热心市民多次发出警告信，揭发包括宏福苑在内的多栋楼宇维修工程涉嫌使用易燃棚网材料，从2024年5月开始前后竟写了至少80封信给房屋署、劳工署、建筑署等各大部门，但无一受到认真回应。这种对群众举报和专业意见的傲慢漠视，正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表现。官僚主义背后折射出的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偏差：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发现和解决问题，而是高高在上、懒于作为，甚至为了“工程进度”和面子工程压制不同声音。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告诫全党，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克服官僚主义，否则干部不闻不问、互相勾结，势必给资产阶级腐蚀侵袭的可乘之机，久而久之党就要变色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宏福苑的惨剧证明，一旦官僚主义占了上风，人民利益和生命安全就会被漠视，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在实践中蜕化为冷漠僵化的官僚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火灾发生后当地一些官员和建制派人士的态度也体现出类似倾向。例如，曾担任宏福苑业主法团顾问的建制派区议员黄碧娇，此前在居民质疑维修工程安全时公开表示：“大维修工程如火如荼进行，必须同心同德为稳定屋苑顺利完成大维修。”这番话将“工程稳定”置于居民安全之上，反映出一种“一切为了维稳和进度”的心态。在这种思维主导下，政府管理者更关心的是工程不受干扰、上层任务顺利完成，而不是认真倾听基层的忧虑。这正是修正主义在政府治理中的体现——形式上打着“稳定”的旗号，实际上偏离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宗旨，把官僚任务和面子工程置于群众生命安全之上。



2. 向资本和利益集团妥协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常常不惜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执政者被资产阶级利益所裹挟，就会出现对资本让步、放松监管的修正主义倾向。在宏福苑事件中，施工承包商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勾连嫌疑引起了广泛关注。据调查，宏福苑的外墙“大维修”工程预算高达3.3亿港元，由一家名为“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承包商中标。该公司投标报价远高于竞争对手（据称高出约1.5亿港元）却仍获选用。更令人震惊的是，“宏业建筑”劣迹斑斑：在2022年至2025年间至少10次违反职业安全条例被检控，其小型工程牌照一度遭暂停续牌。如此一家安全纪录不良的公司，却能以天价中标涉及数千居民生命安全的维修工程，背后显然存在猫腻。有香港媒体指出，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猫腻”——因为“大维修”在香港已成为巨大利益输送的灰色地带，某些亲建制的社区组织和承建商之间可能关系密切，通过业委会等渠道染指工程项目。例如前述黄碧娇议员就被指在法团选聘承建商过程中发挥影响力。尽管她和其政党（民建联）否认介入招标，但她的角色引发公众质疑：作为亲政府阵营人士，她所在的利益网络是否对工程承包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这一疑问并非空穴来风。观察家指出，中共在香港通过各种组织（包括业主立案法团这类“卫星组织”）渗透基层事务，在城市改造等“大生意”中获得利益。这意味着香港整体制度可能已被利益集团和权势者绑架，公共工程沦为牟利工具，监管者对资本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次火灾的诱因正体现了这种资本妥协的恶果——易燃的发泡胶和不合格的防护网之所以堂而皇之地使用，正是逐利驱动和监管失守的结果。如果没有幕后默许，施工单位怎敢违反安全常识，以廉价易燃品替代合规材料？如果没有利益交换，审批部门怎会对明显高出行情的投标视而不见？可以说，从承包商遴选、材料采购到施工监管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对成本和利润的考虑，多过对安全的坚守。这种对资本利益的妥协实质上就是一种修正主义表现：政策执行被扭曲为服务少数人敛财，而非服务广大人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宏福苑事件中，我们看到资本逐利的冲动和腐败勾结的黑暗正是悲剧的重要催化剂。反观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本应是严格管制资本逐利冲动、保障劳动人民福祉。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如果监管体系被资产阶级利益左右，那么修正主义思想就会乘虚而入、为虎作伥，令原本应维护人民利益的治理变质走样。

此次火灾的诱因正体现了这种资本妥协的恶果——易燃的发泡胶和不合格的防护网之所以堂而皇之地使用，正是逐利驱动和监管失守的结果。如果没有幕后默许，施工单位怎敢违反安全常识，以廉价易燃品替代合规材料？如果没有利益交换，审批部门怎会对明显高出行情的投标视而不见？可以说，从承包商遴选、材料采购到施工监管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对成本和利润的考虑，多过对安全的坚守。这种对资本利益的妥协实质上就是一种修正主义表现：政策执行被扭曲为服务少数人敛财，而非服务广大人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宏福苑事件中，我们看到资本逐利的冲动和腐败勾结的黑暗正是悲剧的重要催化剂。反观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本应是严格管制资本逐利冲动、保障劳动人民福祉。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如果监管体系被资产阶级利益左右，那么修正主义思想就会乘虚而入、为虎作伥，令原本应维护人民利益的治理变质走样。

3. 对工人群众生命安全的漠视：马列毛主义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要求切实保障群众安全福祉。然而宏福苑大火暴露出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维稳目标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被忽视，工人和普通群众成了最大的牺牲者。首先，从工人阶级角度看，此次火灾的起因之一很可能是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工人违规操作引发火情。例如有举报称工人曾在棚架上吸烟乱丢烟蒂，导致险象环生。如果施工单位和监管部门真正重视工人安全教育和施工现场防火管理，这类隐患完全可以杜绝。然而现实中，工人的呼声和权益往往被压到次要地位——他们既无法左右工程使用安全材料的决策，也无力确保自己在高危环境中得到充分保护。工人付出了劳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置于危险境地，甚至五名在场施工工人最终丧生于火海之中。这种对一线劳动者生命的漠视，正是资本压迫劳动的典型体现，也是修正主义路线助长下的悲剧结果。

其次，从普通居民角度，宏福苑大火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尤其令人痛心。宏福苑居民中约四成为65岁以上长者，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因逃生不及而罹难；一些受雇于居民家庭的外籍女佣也在灾难中遇难，她们平日默默服务家庭，却在危急时刻缺乏自救条件；更有父母双亡的孩童、痛失亲人的家庭，瞬间跌入苦难深渊。所有这些遇难者，都是社会底层或边缘的普通人——他们没有特权，没有资源，只能寄望政府和制度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然而这场火灾证明，在修正主义歪风影响下，公共安全网络出现了致命的漏洞，最无辜、最弱势的群众却承担了最大代价。事后，有媒体感叹这是“原本可避免的悲剧却因为港府对民众投诉置之不理而发生”，直指政府部门怠忽职守、卸责推诿，使得无辜市民送命。这再次应验了马克思主义的警示：当权力与资本结盟而脱离群众监督，遭殃的终将是劳动人民自己。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告诫干部：“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遗憾的是，宏福苑事件中相关各方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从忽视居民和工人的预警，到使用廉价危险材料降低成本，再到逃避监管责任任由隐患累积，每一环节都体现出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这样的教训无比惨痛。正如毛泽东所言：“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在香港这块中西交汇的土地上，如果不格外警惕资本逐利和官僚懈怠之风，对人民安全的漠视就难以根除。宏福苑之殇警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反对一切漠视工人群众利益的修正主义行为，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4. 借维稳之名压制批评的现象：令人忧虑的是，在这场灾难引发的舆论风暴中，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的某些反应进一步体现了修正主义的政治手法——即以“维稳”为由压制正当的批评和追责呼声。火灾发生后，当市民团体要求独立调查、追究官员责任时，港府非但没有积极回应，反而动用《国安法》等手段打压异见者。11月29日，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以“涉嫌煽动罪”带走了一名24岁的大学生关靖丰——他正是网上请愿联署的发起人之一，仅仅因为呼吁政府问责就遭如此对待。其后，一名前区议员和一名赈灾义工也先后被拘捕，罪名同样是“涉嫌藉火灾煽动憎恨政府”等等。当天，中联办的国安公署更发表强硬声明，指责所谓“反中乱港分子”“借灾祸生事”，扬言支持特区政府严惩“以灾乱港”的行径。李家超也警告传媒：“任何人胆敢利用这场悲剧破坏社会，都将受到严厉追究”。

这种如临大敌的高压姿态，实际上是在将合理的问责要求政治化，把关心公共安全的公民打成别有用心敌对势力。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应当勇于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将人民的不满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然而修正主义者害怕群众、害怕批评，往往对内压制民主、对外妥协退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列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所谓‘教条主义者’对他们的批评，严密封锁，像防瘟疫一样。”香港当局对待追责呼声的反应，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虚心检讨自身责任，而是急于封堵民间声音，将问题上升为政治安全问题。这种“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与社会主义应有的自我批评和人民民主背道而驰，却与修正主义路线下的官僚特权心态不谋而合。其结果，只能进一步疏离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激化矛盾，为更严重的社会危机埋下隐患。

综上所述，宏福苑大火暴露出的不仅是技术和管理失误，更深层的是治理理念上的偏差。政府治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资本权势的妥协、对工人群众利益的忽略，以及为掩盖矛盾而打压批评的举措，都体现出一种脱离群众、背离革命初心的修正主义倾向。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光辉可以帮助我们透视这些问题根源，并为指明纠偏方向提供思想武器。



结论：反修正主义的立场与未来斗争方向

宏福苑大火的惨痛教训警醒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决不能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航向。一旦让修正主义思潮在政策和实践中占据上风，人民群众的安全福祉就会受到侵害，革命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毛泽东曾经断言：“如果我们的干部...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番话对今天依然具有警示意义。要防止“变颜色”，就必须高举反修防修的旗帜，对各种背离群众路线、服务特权资本的现象作坚决斗争。

第一，重申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强化群众监督机制。反修正主义的根本立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把服务工农大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政府必须深刻反思宏福苑事件中的教训，检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在制度上确保群众的意见能够被充分听取和反馈。未来应建立更透明的社区治理和公共工程决策机制，例如赋予居民在住宅维修等事项上的实质参与权，设立独立的安全监督委员会，鼓励工会和专业团体对安全隐患进行举报监督，而非视批评者为敌对势力加以打压。只有让群众真正参与、监督政府工作，才能确保执政路线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第二，坚决同官商勾结和腐败利益链作斗争。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腐败和资本利益对政权的侵蚀是社会蜕化的主要危险之一。针对宏福苑大火暴露出的招标黑箱、监管失职等问题，必须彻查到底、严肃问责。反修斗争要求我们决不姑息任何权钱交易和见利忘义的行为。未来应完善公共工程招投标和施工监管的法治体系，加大对违规企业和渎职官员的处罚力度，让那些罔顾人民安全的资本和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同时，要警惕资本通过统战组织、基层团体对社会治理的渗透，对任何企图利用政治影响力谋取经济私利的势力予以及时揭露和制裁。只有斩断官商勾结的链条，才能铲除修正主义滋生的土壤，使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价值得到捍卫。

第三，把保障工人和群众安全作为发展红线。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和普通群众的生命为代价。这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红线。借鉴历史经验，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尽管物质条件有限，但非常强调生产安全和群众利益，以免重蹈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草菅人命的覆辙。今日香港乃至整个中国，都应重温这一初心。对所有涉及公共安全和劳动安全的领域，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加大投入完善安全标准和应急体系。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高楼，防火、防灾措施必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不能再以任何借口怠忽。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杜绝类似宏福苑大火的人祸悲剧重演。

第四，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反对以维稳名义压制民意。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高度的政治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够坦然面对自身问题并加以纠正。反修正主义要求我们勇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讳疾忌医、更不能以高压手段压制民众诉求。未来的斗争方向应该是砸碎国家机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下，进行继续的革命，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与资产阶级的残留作斗争，最后达到共产主义。

当人民群众善意提出批评、要求伸张正义时，执政者应当倾听和回应，而不是动辄扣上“煽动仇恨”的帽子。事实证明，过度的政治高压只会激化不满，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我们应牢记列宁的教导：“无产阶级专政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参与管理的最充分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专断。”真正的稳定有赖于真诚的人民团结和制度改进，而非压抑不同声音。只有坚持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进步，防止修正主义滋长。

结尾以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来看，宏福苑大火不仅是一次严重的公共安全事故，更是一次警钟，提醒我们要时刻防范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侵蚀。每一条生命的逝去都在警示：脱离人民的路线、向资本妥协的路线是行不通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展望未来，我们必须重新振作革命精神，牢牢树立反修防修的意识，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我们应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团结一切真正关心人民福祉的力量，敢于向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说“不”。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宏福苑遇难同胞的在天之灵，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至于因一时的偏离和妥协而“改变颜色”。正如革命先辈所倡导的，我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更坚定的反修斗志去迎接未来的挑战，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勇敢追梦”抑或资本枷锁？——马列毛主义视角下对央视美团短片的强烈批判

引言

11月28日，央视联合美团发布了一则宣传短片，讲述一名平面设计师白领辞职转行做外卖骑手，并将这一选择包装成「勇敢追梦」「奔向自由」的正面故事。片中女主角宣称，送外卖带给她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能够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自由，以及随时切换身份的新鲜体验，使她“感觉离梦想更近”。然而，这则试图营造“正能量”的短片一经推出便遭到观众强烈反弹，被批评为严重脱离现实、粉饰资本剥削的“苦难美学”宣传，最终不得不从央视平台悄然下架。本文将以极其鲜明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对此事件进行深刻批判。从意识形态、阶级关系、劳动异化和修正主义宣传等方面入手，我们将揭露这部短片如何在形式上美化资本主义压迫的现实，本质上却掩盖了劳动者被迫灵活就业的结构性困境，警醒广大劳动群众认清资本与修正主义的宣传陷阱。

批判一：用“奋斗追梦”叙事掩盖外卖平台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一名外卖骑手冒着暴雨在积水中艰难前行送餐，现实中的外卖工作远没有宣传片中那般轻松惬意。央视美团短片把一个白领主动投身外卖业描绘成追求自由和梦想的励志选择，仿佛骑手工作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然而，这种“奋斗追梦”的叙事完全背离了外卖骑手的真实处境，意在用个例的假象遮蔽平台资本对骑手群体的剥削。

首先，短片营造了一幅外卖生活自在畅快的图景：故事取景于风景优美的云南大理，女主在镜头中佩戴着价值上万元的单反相机穿梭送餐，自称工作两个月就买了新相机并办了摄影展，表示送外卖让她“找到了人生的幸福”。这样的情节几乎是在暗示：靠送外卖既能糊口又能圆个人爱好之梦，“奔向自由”的职业选择甚至带来丰厚回报。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外卖骑手都面临着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条件。算法压榨下的送餐工作被骑手们形容为“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为了在极短时间内送达订单，



很多人被迫超速、闯红灯、逆行，否则就可能超时遭差评、扣薪乃至失去饭碗。有美团骑手回忆他经历过“最疯狂的一单”：距离仅1公里却限时20分钟，他为了不超时骑得飞快，连臀部都几次颠离座位。这种情况下哪还有心思欣赏什么“沿途风景”？正如一位上海骑手无奈坦言，他几乎每单都得逆行抢时间；倘若严格遵守规矩不违章，他一天能送的单量会减少一半。可见，所谓送外卖的“自由”，在平台资本设置的严苛时间算法面前，实际变成了骑手以生命安全为代价的高速奔忙。短片里女主“两个月买新相机办展览”的神话更是与现实天差地别：据调查，在订单量激增的恶劣天气里，骑手往往疲于奔命却难免超时被罚款，哪怕冒着暴雨连夜配送，月底结算收入仍会因超时处罚而大幅减少。如此境遇下，多数骑手别说追求摄影梦想，实现基本的收入稳定都异常艰难。

更深层次的批判在于劳动异化的视角。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工人对劳动本身是被动和被迫的，劳动过程让工人感到身心俱疲，只有在劳动之外才能体会到自由和愉悦。短片却颠倒黑白，硬把高度异化的外卖送餐劳动描绘成追求自由和快乐的途径。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倒置：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在劳动中不会感到幸福，只有痛苦；只有不劳动时才感到自由”。但影片中的女骑手恰恰声称因送外卖而获得自由与幸福——这完全违背了无产阶级劳动的真实感受，是对劳动异化现状的粉饰。事实上，平台资本一方面通过算法和罚则将骑手变成高速运转的齿轮，让劳动者沦为创造利润的工具人；另一方面又试图用“自由欣赏风景”“实现梦想”这类话语麻痹工人，让他们在心理上接受被异化的劳动，把沉重的剥削包装成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正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欺骗伎俩：用虚假的奋斗叙事来遮盖剥削关系，让无产者对自身受压迫的处境产生错觉。归根结底，无论宣传如何涂脂抹粉，外卖平台资本逐利本性的铁律不可改变——正如马克思揭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只关心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工人无论怎样卖力，“地位永远处于最低层”。短片里的美好自由，不过是替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幻影，企图将血汗劳作漂白成个人圆梦的康庄大道。

批判二：主流媒体与资本勾结的修正主义宣传逻辑

这部短片之所以引发众怒，不仅因为其内容脱离实际，更因为它体现了主流媒体与资本勾结、合力编造谎言的修正主义宣传逻辑。按理说，作为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央媒，央视应该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映劳动人民的真实呼声；然而此片却是由央视与美团资本联手打造，其立场公然站在了资本一边，为剥削制度涂脂抹粉。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当今宣传领域中修正主义思潮作祟的结果——表面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传播的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共产党之名行资本压迫之实。

首先，我们需要点破这套宣传话术背后的阶级属性。马克思早就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主流话语往往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现行物质关系的延续发展辩护。眼下这支短片所宣扬的“正能量”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希望无产阶级接受的思想：让劳动群众相信个人奋斗可以换来自由和梦想，从而忽视对剥削制度的质疑。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其本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输出。然而，荒谬的是，承担这一意识形态生产的竟是号称人民喉舌的中央媒体！央视与美团的合作，意味着资本不仅控制了物质生产资料，也在操控精神生产资料，把持舆论工具来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叙事。本应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媒体沦为替资本张目的工具，这正是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点，宣扬阶级调和甚至倒向资产阶级立场。毛主席早在1962年就严正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遗憾的是，如今某些宣传工作者早已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条纲，热衷于唱资本的颂歌。正因如此，他们才会想出用“正能量叙事”叠加“苦难美学”的方式来粉饰现实，完全无视底层民众的苦难，将其歪曲成值得歌颂的奋斗故事。



事实上一系列类似的宣传“翻车”早有先例。短片推出后，不少网友想起央视在2023年的另一部短片《靠力气赚钱心里才踏实，是无数平凡人的生活信仰》。那部片本想歌颂底层劳动者，却因严重脱离实际遭到群嘲，尤其是片中出现了穷人和保时捷车主迎面而行的画面，被讽刺为现实版“何不食肉糜”，结果同样以彻底翻车收场。这种“苦难就是幸福”的叙事套路之所以一再失败，正是因为创作者站在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视角，全然不顾真实的民生疾苦。他们缺乏对无产阶级痛苦的起码了解，只会拍脑门编造荒诞不经的剧本，结果当然不靠谱。此次央视美团短片更是将这种脱离群众的宣传推向新高——甚至不惜找来演员演戏欺骗大众。据曝光，片中饰演“外卖员阿岚”的其实是一名女演员。她在短片发布后曾兴奋发帖说“我上央视了”，自称拍摄当天“淋着雨跑了很多楼梯，体会到了外卖员的辛苦”。可风波骤起后，这位演员很快发声明澄清：“我只是一个普通演员，只知道角色是‘外卖员’，具体内容一概不知。短片里的摄影器材是剧组道具，并非我个人物品。”换言之，连她本人都觉得剧本情节荒唐！如今这名演员的账号被封，央视新闻也下架了视频。此事坐实了短片完全是一出有剧本、有道具的伪纪录，所谓“白领勇追梦”纯属策划的骗局。一些网友愤怒地表示：

“用演员演出来美化苦难？无耻至极！”“脱离实际的宣传就是耍流氓！”更尖锐的评论指出：“这不是励志故事，是精神诈骗”。这些声音代表了广大群众的觉醒：大家已经越来越看穿这种媒体与资本合谋炮制的虚假宣传，对其欺骗性质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从马列毛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宣传正体现了一条典型的修正主义逻辑：即在阶级矛盾依然尖锐的社会里，不去揭露和解决压迫与剥削，反而通过舆论机器粉饰太平，宣扬一种超阶级的虚假和谐。正如列宁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利用他们掌控的舆论来欺骗人民，使工人阶级在虚幻的和解叙事中丧失斗志。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则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替资产阶级办事，用貌似积极向上的话语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罪恶。“新时代”的这种正能量鸡汤，说到底还是麻痹工人阶级的精神鸦片，让劳动者误以为靠个人奋斗就能冲破阶级枷锁。它否认了制度性压迫的存在，把结构性失业、降薪和灵活用工的问题简化成个体选择问题，把无产阶级应有的愤怒引导成对现实的盲目感恩。这就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修正主义毒素：宣扬阶级合作，抹杀阶级斗争，从思想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彻底的批判。

批判三：用马列毛主义视角重析“追梦”与“自由”的真谛

短片鼓吹的“追梦”和“自由”，看似光鲜动人，实则是经过资产阶级改造的虚假概念。只有回到马列毛主义的立场，我们才能重新厘清这两个词的本质含义，认清真正值得追求的梦想和自由是什么。

首先谈“追梦”。影片中的女主角把放弃白领稳定工作、跑去当骑手美其名曰“追梦”，仿佛只要个人有激情有勇气，在哪条路上都能实现自我价值。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个人梦想从来不是孤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个体的命运总是受到整体阶级处境的制约。如果大环境是资本对劳动的全面压榨，工人阶级普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那么鼓吹个别人通过顺从这一环境就能“梦想成真”，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上，这种宣称在剥削条件下也能成就梦想的论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手段，它转移视线，让工人把成功与否归结为个人努力或性格抉择，而忘却了梦想受限于客观的阶级条件。真正的无产阶级之梦从来不是几个体面的小资幻想，而是要消灭造成普遍不幸的制度根源，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最后得出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后得出的深刻结论。换言之，无产者最伟大的梦想，不是当什么“数字游民”拍拍风景照，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解放全社会受压迫的人们。这才是马列毛主义视角下追梦的真谛：个人梦想只有融入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中，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任何鼓吹在资本枷锁下搞自我圆梦的说辞，都是对真正梦想的矮化和背叛。毛泽东曾号召革命青年树立“为中华之崛起”“为人民谋幸福”的远大志向，这与短片鼓吹的那种自我小确幸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追求的梦想，不应是苟且偷安、委曲求全地在剥削秩序中谋得一隅，而应是砸碎锁链、彻底翻身解放的壮丽愿景。

再说“自由”。片中女骑手反复提及送外卖带来了“自由”——自由欣赏沿途风景，自由切换人生角色等等。然而这种自由只是资产阶级话语施展魔法的结果：把被迫谋生粉饰成自主选择。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表面上是“自由”的：人身自由，契约自由，想干什么工作似乎由自己决定。但正如马克思揭示的，这种形式上的自由掩盖着深刻的虚假性——工人“自由”的前提是他别无他途，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否则就无法生存。这种“自由”，其实就是被迫的自由：工人被迫自由地去选择哪一家资本家来剥削自己。短片中的主人公辞去白领工作跑去当骑手，看似潇洒，其实大背景无非是当前资本主导下的经济现实使然。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内卷压力下，许多青年不得不加入外卖送餐等灵活就业大军。她所谓“追求自由”，在更多普通劳动者身上却是“被迫谋生”。即便她真心热爱摄影，难道没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环境让她追求艺术理想，只能靠给资本送外卖来“曲线圆梦”，这难道不是制度的不自由吗？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认为，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在阶级压迫的条件下实现。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成。在那里，劳动不再是异化的强制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条件。这种境界下的自由，才是真自由。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所谓“自由”，要么是资产阶级为所欲为剥削他人的自由，要么是劳动者被迫在压迫下求生的“自由”。列宁曾痛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只是一套骗局，因为在资本统治下，多数人民根本无法真正行使自由。同理，资产阶级宣称的个人奋斗自由、择业自由，也是一种虚假宣传——当劳动大众仍受制于资本、为温饱奔波时，谈何真正的自由？毛主席也强调过，没有人民的解放，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自由可言。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短片中宣扬的那点“小自由”，实际上是要工人放弃对大自由（免于剥削的自由）的追求。一个骑手或许可以自由选择今天接多少单、跑哪条路送餐，但他无法自由选择不被剥削、无法自由决定缩短劳动时间或者提高报酬。在资本面前，劳动者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又有什么实际自由可言？因此，从马列毛主义角度出发，我们要揭穿这种虚伪的自由观，号召劳动者去争取真正的自由——也就是摆脱资本桎梏的自由，当家作主的自由。归根结底，“追梦”和“自由”这些词汇如果脱离了阶级分析，只剩下空洞的资产阶级修辞。只有回到无产阶级立场，这些概念才能获得科学的内涵。我们的梦想，是劳苦大众集体翻身解放之梦；我们的自由，是彻底砸碎剥削锁链之自由。任何把资本压迫下的屈辱处境美化为梦想和自由的论调，都是对这两个神圣概念的亵渎。马列毛主义者应当理直气壮地捍卫真正的梦想与自由观念，帮助群众认清那些虚假的宣传把戏，不为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所迷惑。



结语

央视与美团合编的这出短片闹剧，再次给广大劳动群众上了一课：资本不仅通过剥削攫取我们的血汗，也试图通过宣传麻痹我们的灵魂。在资本的“美容师”巧手下，血淋淋的剥削被描绘成彩虹般的梦想，艰辛困苦的谋生被粉饰为追求自由的浪漫。然而正义终究藏不住：影片遭到全民群嘲、迅速下架的结局，证明工人阶级并不愚蠢，上了当受了骗是会觉醒奋起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擦亮眼睛，识破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宣传陷阱，不管它打着多么温情脉脉的旗号，都要透过现象看清背后的阶级本质。当主流话语一味叫我们知足感恩、自我奋斗的时候，正是要警惕他们在转移我们对不公现实的注意力。资产阶级和其走狗可以编造一个又一个“阿岚”的故事，但却无法改变亿万劳动者被压迫剥削的真实命运。与其沉迷他们设计的美梦，不如直面残酷的现实。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冷酷无情，看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欺骗伎俩，也看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那样：“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唯有团结起来，奋起进行阶级斗争，我们才能摆脱一个又一个所谓“梦想”的麻醉，赢得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让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戳穿一切美化资本的谎言！广大劳动群众应当擦亮眼睛，不要被动喝下资产阶级熬制的“鸡汤”，而要勇敢地举起反抗的铁拳。我们的道路不在资本为我们虚构的乌托邦中，而在脚下这片饱含阶级斗争血泪的土地上。认清敌人的面目，听从自己阶级的声音，以革命的决心和组织的力量投身斗争——这才是对“勇敢追梦”最大的讽刺，也是对真正自由的最有力争取。正当其时，起来，饱受剥削压迫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团结斗争，用实际行动粉碎资本和修正主义的迷梦，共同创造属于无产阶级的光明未来！

论吸毒记录的封存

事件背景概述

2025年11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根据法规草案的相关条款，所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包括吸毒行为所致的行政处罚记录）均应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公开，但公安、司法等机关为办案需要时可依法查询。这条新规定公开后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11月27日，兵团禁毒部门官方抖音发布介绍新规的视频，明确“2026年新规：吸毒记录可以封存……所有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包括吸毒记录）应当予以封存”。消息传出后，南通市文旅局官方账号评论道“哪位少爷吸了”，引发网络热议，并令该账号粉丝数从35万激增到400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12月1日作出解读：所谓“封存吸毒记录”仅针对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记录本身仍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并未被彻底删除；网约车、幼师、保安等关键行业依然可以依法查询相关记录。官方强调，该制度意在让轻微违法者“摆脱终身标签”，促进其回归社会。然而，这一措施在网络上引发了汹涌的舆论反弹——不少群众质疑“封存=纵容”，担心“打开了吸毒新绿灯”。

政策实施中的阶级倾向批判

官方话语宣称此举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为轻微违法者“松绑”。但仔细剖析可见，这一制度恰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偏向和意识形态倾向。首先，受益者与受制者的不对称显而易见：在当前社会，轻微吸毒的群体通常是底层大众，他们往往因各种社会矛盾陷入误吸的困境。而顶层大毒枭、高官走私团伙等真正的阶级敌人依然被严惩，甚至得到刑事法律的加重制裁。换言之，这项规定主要“袒护”是社会底层或边缘人群的小错，却对掌握巨大经济权力的毒品供应方和利益方没有丝毫宽松。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掩盖毒品问题背后的阶级本质：毒品泛滥源自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敛财工具，而当局只是在事后给涉毒者贴上“可封存档案”的标签，却不触及毒品供给链的核心利益结构。其次，这项制度宣称的“平等保护”掩盖了不同阶层截然不同的感受。法律条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查询”，听起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有后台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随时查询甚至消除污点；相反，普通民众一旦被打上违法记录，就可能丧失就业、升学等机会。正如法律专家所言，封存制度的核心是“限制查询”而非“抹除记录”，记录仍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复犯时会被严惩，各类政审、招录也可依法查询。然而，这种“有限查询”的设计对一般劳动者的帮助有限：即便记录封存，他们在求职、考公、入学等环节依然会受到多重隐性限制。更何况，若当局想要从政治上保护某些特殊群体，



只需以更高的“法定需求”方式默许查询或不予通报，根本无需修改法律条文。因此所谓“人人平等”，实际上不过是表面修饰，其实际效果是给统治集团打上“依法办事”的外衣，淡化了上层社会对毒品泛滥所负的责任。

此外，对“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辞的宣扬，也使得大多数群众难以区分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可救助的群体。毛泽东时代的禁毒经验正是强调阶级分析：对待大毒枭、大制毒犯要“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而把吸毒者当作阶级兄弟加以“救治”、“政治教育”；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与此相反，当前的论调却把吸毒行为简单等同于其他轻微违法行为，主张对吸毒者一视同仁，不愿单独对待。正如参与制定法律的代表朱征夫所言，如果把吸毒单列于外，将背离法治平等原则，造成新的制度歧视。但这一观点完全忽视了阶级立场：实际情况并非所有犯罪都应一视同仁，毒品流行与阶级压迫、资本渗透密切相关，应予以重拳而非轻描淡写。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将吸毒档案与所有治安记录一并封存，是意识形态上的遮羞布——它转移了社会对毒品问题根源的关注，表面上是彰显宽容，其实在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涂脂抹粉，为现行统治粉饰正义。

网络舆论中的修正主义言论分析

网络上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言论大多鼓吹对封存制度的支持或合理化，实际上都服务于资产阶级叙事。比如，有评论将该制度视作对犯罪分子“宽容温情”的法治进步，称之为“法治文明的温度”；有文章主张用“专业理性”去化解民众的情绪，认为群众应当“与时俱进”看待法律改革。这些论调反复强调“记录封存并非消除”，号召舆论不要陷入道德偏见，试图将问题技术化、理性化。然而，它们刻意忽视了群众关注的焦点——阶级与安全。在广大劳动群众心中，“吸毒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术语，而关乎对禁毒斗争成果的敬意和对基层安全的底线要求。于是网络上更朴素的声音不断涌现：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试一次也没关系，反正会封存，没有谁知道，这样的法条就是给吸毒开了口子”；有人质问“凭什么他们一句‘我错了’，就能和我一样清清白白？”；还有人怒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铭记虎门销烟，远离毒品，致敬缉毒警察！我们要的是寸步不让的立场！”。



这些直白的语言反映出民众对政策背后隐含的阶级含义深恶痛绝：他们质疑为何某些人可以因一句“我改正”而擦去污点，而自己依旧背负污名；他们强调必须对毒品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相比之下，那些鼓吹“宽松”、“理性”的观点，被群众视为对禁毒斗争的背叛，是维护上层利益的反动言论。正如思想家沈逸指出的，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吸毒记录封存往往是合法化的前奏，他怀疑这项法案的通过或受到某些别有用心势力的推动。网民的愤怒也催生了新的参政热潮，不少民众通过国家法律库、中国政府网等渠道提交意见，努力让权力机关听到他们的声音。

马列毛主义对毒品问题的立场与历史经验

历史证明，禁毒必须以阶级斗争作为根本立场。毛泽东时代，中国历经三年人民战争，就清除了鸦片和色情的泛滥，实现了“中国，既无娼妓，也无鸦片”的伟业。毛主席曾断然宣称：“烟毒不除，国无宁日！……如果我们的国家也像旧社会那样，那是对人民的犯罪！”他强调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了让人民作主人，“如果人民还躺在烟馆里……那算什么主人？那还是奴隶！”在毛泽东看来，禁毒不仅是挽救生命，更是拯救民族灵魂。对比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去罪化”、“减害化”政策正是对吸毒者的纵容，也是对劳动人民生活权利的漠视。马克思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尖锐讽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强调资本家将人命置于利润之下的残酷本质。马克思也警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在今天，真正麻醉人民的，是资本主义自诩“文明”的毒品文化，它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使阶级斗争意识麻木。毛泽东时代对待毒品问题采取了精准的阶级分析：对大毒枭坚决镇压，而把吸毒者当作阶级兄弟加以帮助。在全国范围发动群众宣传教育，让无数染上毒瘾的人通过劳动与教育重新做人，“很多老烟民……第一次穿上干净的工作服，走进工厂劳动，拿到第一笔干净的工资时……‘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共产党把鬼变成了人！’”这些历史事实昭示我们：唯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才能摧毁毒品与反动势力的结合。

结语：认清修正主义遮羞布，开展思想斗争

当下所谓“封存吸毒档案”的政策，打着“法治进步”

“人权保障”的旗号，本质上是对斗争本质的遮羞。它淡化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社会的毒害作用，使一部分受害者以为只要“承认错误”就能抹去痕迹，从而淡忘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这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毒品问题不是简单的健康问题，而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任何软化禁毒斗争的倾向，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清那所谓“宽容理性”的论调背后实质，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话术。正如毛主席所言：“在毛主席看来，禁毒不仅是救命，更是救心，是重塑民族魂魄”。今天，面对舆论场上的混淆与迷雾，我们要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立场，高举反修反霸大旗，以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戳穿修正主义的遮羞布。

正如红色文献所警示的那样，这是关系人民尊严和社会前途的一场斗争：是“关于人类尊严的保卫战，是一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腐蚀的持久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让中国人民站着生，站着死，绝不跪着活！

2026年新规 吸毒记录可以封存

自2026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
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
(包括**吸毒记录**)
应当予以**封存**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
提供或者公开



以阶级斗争为纲：石家庄外卖员持刀反击事件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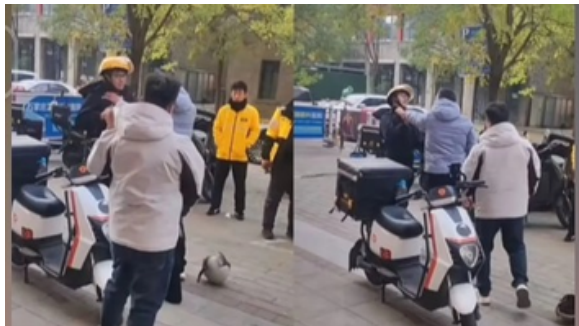
事件概述：新无产阶级的血色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025年11月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一起外卖员持刀反击站长事件，再次生动印证了这一铁律：当剥削压迫积累到一定程度，阶级矛盾就会以激烈甚至血腥的方式爆发。

据报道，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在离职结算时发现原本每单5元的配送费被站长克扣到仅剩1元，扣款率高达80%，相当于一个月白干，工资差额约三千元。愤怒的骑手找站长讨要血汗钱时却遭到正副站长辱骂和殴打。在一比二的劣势下，小哥情绪失控，从口袋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连刺站长和副站长，导致二人重伤倒地。事发后骑手并未逃跑，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控制。这一事件视频传出后迅速引发公众关注，网友普遍同情外卖小哥，感叹“不要欺负老实人，逼急了也会出事”。这起“外卖刀哥”事件表面上是一起个人冲动伤人案件，但深层次上是当代阶级斗争的一次极端体现。

在这场冲突中，对立双方的阶级属性十分鲜明：一方是被残酷压榨的新产业无产阶级——外卖骑手，另一方则是代表平台资本行使管理、剥削职能的基层代理人——站点站长。外卖骑手作为城市服务业大军的一员，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的“新无产者”：他们卖力奔波送餐，却缺乏基本劳保和稳定收入，仅凭微薄佣金糊口。相反，平台为了追逐利润，设立层层管理者对骑手进行考核和盘剥，站长正是替资本监督压榨骑手的资产阶级走狗。据知情者透露，石家庄这名骑手被迫离职，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站长肆意剥削其剩余价值：入职前口头承诺每单5元，到结算时却单方面撕毁约定，以各种名目扣掉80%工资，把骑手劳动成果据为己有。骑手讨薪本是合情合理，但站长为了替平台和自己攫取更多利润，恬不知耻地侵吞工人工资，将老实勤恳的劳动者逼上绝路。

这起冲突并非孤立偶发。从近年来频繁见诸报道的外卖员罢工、讨薪事件可以看到，在平台经济的多重压迫下，外卖骑手与资本的矛盾日益激化。骑手们工作强度极大、收入低微，还要承担超时罚款、客户投诉扣钱等风险，稍不如意就被站长克扣工资或辞退。在层层剥削之下，全国各地外卖员罢工抗议、冲突斗殴的事件屡有发生，骑手们常被迫以极端方式对抗站长的压迫。石家庄刀刺站长一事正是这尖锐对抗性矛盾的一次爆发。在阶级斗争视角下，它体现了新兴无产阶级忍无可忍、拿起武器反抗资本代理人的阶级怒火。正如有评论所说：“5元派送费变1元，血吸干了还想食肉”，外卖小哥的愤怒一刀既是对自身尊严的捍卫，更是对赤裸裸资本剥削的反抗。



平台资本压迫下的对抗性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平台资本主义，用算法和管理层级将骑手的剩余价值榨取到极致，被视为当代血汗工厂的新形式。外卖平台凭借垄断地位，建立了一套只对自己有利的霸权体系：平台享受高额利润，却把风险成本转嫁给最底层的送餐员和商家——配送超时罚款骑手，客户差评处罚骑手，平台抽成却不承担相应责任。据央视财经评论指出，美团等外卖帝国创造了数十亿利润，骑手们却难分一杯羹；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谁饿了，美了谁？”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剩余价值剥削”。遍身绌罗者，不是养蚕人；骑手汗水酿蜜，替谁辛苦替谁甜？巨额收益尽入资本腰包，而一线劳动者仍在贫困线上挣扎，这种两极分化昭示了平台资本与劳动者利益的根本对立。

石家庄事件中，站长扣下骑手80%工钱的举动，正是资本无情压榨的一个缩影。外卖站长作为平台雇佣的管理者，其收入直接或间接与手下骑手的业绩挂钩：骑手接单越多、跑得越快，站长提成越高。在这种利益机制驱使下，不少站长千方百计压榨骑手——随意克扣薪资、滥用罚款权力，甚至最近曝出某些站长威胁骑手行贿送礼，否则就不给派单。骑手不仅要被平台剥削，还要再被站长盘剥一遍，可谓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政府新推出的强制社保政策表面上要求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实际上企业往往将成本转嫁给骑手，以摊派费用等形式继续搜刮骑手的收入。“层层压迫”之下，外卖骑手长期处于被剥夺权益的弱势地位，他们与平台资本及其代理人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

这对抗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利益上：一方是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平台及站长，另一方是出卖劳动力却难以维生的骑手阶层。日常管理中，站长对骑手呼来喝去、辱骂罚款，将其当作廉价机器，使骑手在身心双重压力下疲于奔命。当骑手稍有不满或反抗，往往遭到报复和打压。石家庄这名骑手不过是讨要自己应得的血汗钱，却被两名管理人员同时掐脖子推搡、拳脚相加。可以说，阶级压迫首先以赤裸裸的暴力形式表现：资产阶级的走狗先动手打人，试图用武力让工人屈服。而当骑手奋起还击，这种反抗的暴力又以更极端的形式回敬了压迫者。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说明，

平台骑手与资本代理人之间已不是一般的劳资纠纷，而是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仇恨。诚如毛主席所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敌我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外卖平台经济中骑手和站长的关系，正是当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新体现，且随着剥削加剧而日趋激烈。

需要指出，外卖骑手群体虽然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但他们与传统产业工人一样隶属无产阶级范畴，是产业工人的新形态。这个群体人数庞大、成长迅速，在全国接近上千万之众（多数为外包用工，无正式合同保障）。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缺乏社会保障和话语权，成为城市经济中最底层、最弱势却又不可或缺的劳动者。由于压迫深重、处境相似，骑手群体内部往往比其他行业工人更具朴素的团结精神：一人有难，附近骑手常会互相支援，对抗站长和资本的自发斗争时有发生。例如近年各地发生多起外卖员集体罢工、围殴站长事件，就是骑手们在高压下联合反抗的结果。然而，这些斗争大都缺乏组织和方向，属于自发性的“义愤”行动。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骑手们往往抓不住主要矛盾，甚至可能在资产阶级挑拨下将怒火错误地指向其他劳动群体（如与保安、商家员工冲突）。这既削弱了斗争效果，又在部分公众眼中造成骑手“暴力野蛮”的刻板印象，反过来降低了社会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像石家庄这起持刀伤人这样的孤勇举动，尽管爆发力惊人、解了一时之恨，但从长远看并不能真正撼动资产阶级的根基。要改变骑手乃至整个工人阶级受压榨的命运，必须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

修正主义路线下的工人阶级受压榨

在社会主义旗下发生如此残酷的剥削事件，暴露出当今中国社会所奉行的实际上是一条反工人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套论调自20世纪80年代确立以来，成为执政当局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政策的理论基石。事实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之流鼓吹阶级斗争熄灭、唯生产力至上的托词，本质上为“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借口和遮羞布。十三大提出“初级阶段”理论，此后历届党代会反复宣称中国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这种主观臆断硬是把一个人口大国定格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状态，的宣传幻景。



为资本主义势力大开方便之门，不仅荒谬而且反动。邓小平的初级阶段论实际是否定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纲领，形成了中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总依据。在这个纲领指导下，当局高喊“发展才是硬道理”，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大规模引入所谓“社会主义”体系，导致资本家阶层卷土重来，工人阶级重新遭受压迫剥削。

“共同富裕”原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共近年来重提的口号。然而在修正主义路线治下，这一口号变得格外虚伪空洞。现实中，财富和权力正加速向少数人集中，工农大众的处境并未因所谓共同富裕而明显改善。以上述外卖行业为例：平台资本几年间造就了身家百亿的富豪，资本家纸醉金迷，而普通骑手依然要为每月几千元奔波劳碌、风餐露宿。这种两极分化与真正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驰。整体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有增无减，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依然偏低。不少资本家享受着超额利润和政策特权，反而克扣工人应得的报酬。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大批企业倒闭或裁员，拖欠工资的现象更加严重，迫使各地工人不断走上维权抗争之路。据统计，2023年全国工人维权事件高达1604起，已超过过去三年全年总和，10月份单月就发生225起之多，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一方面是官方鼓吹的“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另一方面却是工人讨薪潮此起彼伏、欠薪跳楼等悲剧频发——这正说明当前的执政路线不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幌子行资本剥削之实。所谓“共同富裕”，在官僚资本和大资产阶级大行其道的今天，无非是空中楼阁般的宣传幻景。

毛泽东时代倡导的社会主义原则（如群众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相结合、缩小三大差别等）早已被修正主义当局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以及对资本的纵容和庇护。当局口口声声“不忘初心”，实际早已背叛了工人阶级立场：他们在经济上推行资改路线，让资本主导资源配置，劳动者权益被置于次要地位；在意识形态上鼓吹民族主义、消费主义，淡化阶级分析和社会主义本质，把“阶级斗争”视为禁忌；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但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严控工人群众自主组织，热衷与资本集团结盟。这样的路线，说穿了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统治路线——虽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

实际骨子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统治。石家庄外卖骑手遭遇的残酷剥削和流血反抗，只是当前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境遇的一个缩影。中国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压迫与剥削，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在现实中的恶果：在“初级阶段”的借口下，资本肆虐横行；在“共同富裕”的幌子下，贫富悬殊愈演愈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

当局对劳工斗争的镇压：服务于资本的“维稳”

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增多的自发反抗，中国当局的回应不是反思剥削根源、保护劳动者权益，反而是以高压手段进行镇压和“维稳”，其立场无疑偏向资本一边。石家庄持刀伤人事件发生后，警方在不到一天内就发布通报，将案件定性为一起普通“工作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强调嫌疑人李某因工作矛盾持刀扎伤两名“同事”。这样的措辞刻意淡化了站长克扣薪资、殴打在先的前因，把严重的阶级冲突描绘成同事间的矛盾冲突。通报只字未提骑手工资被扣的事实，更避而不谈矛盾背后的用工剥削问题。这种选择性的叙事，无异于为资方开脱，将一场压迫引发的反抗消弭于无形。在舆论层面，相关视频因“有点血腥”被迅速下架删除。可见，当局并不愿让公众看到劳资冲突真相，更不愿引发同情工人的舆论潮，将此事的讨论严格控制在刑事案件范畴内。

更加严重的是，当局长期以来禁止和打击工人阶级的一切独立组织和有力反抗。中国现有的工会体系名义上是“工人之家”，实际上受党和政府控制，根本无法代表工人利益。在企业发生劳资纠纷时，官方工会大多形同虚设，甚至帮助资方压制工人。而当工人试图自主组织维权时，等待他们的往往是警察的镇压和清算。中共政权历来对独立工人运动采取零容忍态度：早在2015年广东省出现罢工浪潮时，当局就有部署地逮捕了多名劳工组织者，以期让工人“噤若寒蝉”。据报道，2015年12月广东警方连续突击搜查劳工NGO办公室和人员住所，拘捕至少21名工运积极分子，扣押文件和电脑，以打击正在萌芽的独立工会运动。这是2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压行动，表明当局不惜采取非常手段阻止工人联合维权。其中著名劳工维权者曾飞洋、朱小梅等人被长期关押，至今仍受到严厉监控和限制。这些案例清楚地显示：当局将任何脱离官方控制的工人集体行动都视作威胁，一旦苗头出现，立即出手压制。

除了打压组织者，当局也常以法律手段惩治参与激进行动的普通工人，以杀一儆百。许多工人因罢工、请愿、围堵厂区等被抓捕扣押，甚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判刑。在石家庄事件中，可以预见这位持刀伤人的骑手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而其被逼维权的动机却得不到制度上的任何救济。官方在谴责骑手“违法”的同时，从未提及要追究站长克扣工资的责任，更不反思平台用工制度的问题。这种选择性执法，实际上是维护资本利益、压制劳工反抗的体现。一边是盘剥工人的恶行得不到惩处，另一边工人的过激维权却受到迅即镇压，法律和权力的天平显然倾斜向了资产阶级一方。

可见，当局所谓“维护稳定”，

本质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和剥削安全。当前中国的国家机器，早已不是真正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滑向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方向：警察、法庭更多地保护资本家产权和统治秩序，却无视乃至侵害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这正印证了毛主席当年的警告：“资产阶级掌握了根本的专政权”，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蜕变得“跟旧社会差不多”。在官僚资本集团操纵下，国家机器成为镇压工人的利器；修正主义当局口口声声代表人民，实则日益脱离群众、站到人民对立面去了。

背离毛泽东路线：从群众路线到修正主义统治

造成以上局面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现政权在经济、意识形态和组织路线上全面背离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始终坚持一条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断进行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共领导集团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走上一条修正主义的歧路。

首先，在经济路线上，毛泽东时代强调自力更生、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同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努力避免两极分化。然而当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唯GDP论的发展主义，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换取高速增长。他们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放任资本挤压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阶级分化严重。这与毛主席提倡的共同富裕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制度背道而驰。毛主席在1975年严厉批评了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直言，我们建立的这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比如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关系、等级工资制等，和旧社会差不多。

这些残余的不平等特权若不加限制，终将滋生新的资产阶级。从80年代开始，中国当权者非但没有遵循毛主席的告诫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了这些特权：重新确立了八级工资制乃至更加悬殊的收入级差，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货币至上，将毛泽东时代努力缩小的差距重新拉大。结果，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走上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老路，资产阶级不仅卷土重来，还成长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权势的官僚资产阶级阶层。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毛泽东倡导群众路线和继续革命理论。他一再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路线视为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毛主席认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领导只能通过走群众路线来实现。然而今天，当权者虽然嘴上不否认群众路线，但实际工作中早已抛弃了“依靠群众”的根本原则。决策由上层精英关起门来拍板，普通群众毫无发言权；

社会矛盾更多依靠高压维稳手段解决，而非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当局怕群众甚于信群众，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毛主席还提出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核心是认为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还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形式的政治大革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众运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胜利后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特权、反对继续革命。毛主席警告说：“有些人民民主革命后当了大官就不想前进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一论断可谓振聋发聩地道出了危险所在。但自从毛主席逝世后，这套继续革命理论被官方迅速否定和丢弃。1978年以来的执政集团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纲；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极尽诋毁，声称要彻底否定，被毛主席列为心腹之患的“走资派”反而堂而皇之执掌了党和国家机器。

今天看来，毛主席当年的担忧一一成为现实。那些曾经被他批判的党内走资派成功夺权后，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与毛泽东路线相反的政策。他们告别革命、躲避阶级斗争，以所谓“现代化建设”之名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社会主义中国渐渐滑向修正主义统治的深渊。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淡忘，“继续革命”的旗帜被扔进历史的仓库。而新的执政者们则从群众中脱离出去，蜕变为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强调党的领导不容挑战，但却早已背叛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当年毛主席发动群众批判走资派、防修反修，正是要防止出现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统治集团。遗憾的是，毛主席身后的中国很快出现了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一个既得利益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形成并巩固，其统治特点正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经济上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政治上专政机器为少数人服务，思想上麻痹人民、压制异见。石家庄外卖员的悲剧性反抗，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英明预见：革命尚未成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毛主席曾设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来清除党内腐败和资本主义苗头，但在他身后这一探索被粗暴中断。如今，我们看到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资本家和官僚全面高高在上，工人阶级重新被压在社会底层。这正说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旦背离，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工人阶级的出路：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建群众斗争组织。石家庄外卖员持刀反抗站长的事件给中国工人阶级敲响了警钟：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寄望于统治阶级良心发现或恩赐改善处境，无异于与虎谋皮。唯有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振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精神，工人阶级才能摆脱压迫命运。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句话在当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几十年来官方宣传弱化阶级分析、回避阶级斗争，结果资本主义势力坐大，工人阶级反而日益被边缘化、被欺凌。我们必须重新高举阶级斗争这面大旗，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凝聚起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从未熄灭，只是无产阶级曾一度被麻醉、被分化。然而只要工人重新燃起斗争的意志，这股力量将是摧枯拉朽的。历史证明，任何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必须通过斗争将其打倒。面对当今资本和权贵的联合压迫，中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只能以阶级斗争求解放。

当然，新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停留在自发、分散的状态。必须重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斗争组织，把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联合成一支有纪律、有方向的革命力量。当年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工会、贫协等组织把广大工农紧紧组织起来，才能打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如今官方工会等组织已经蜕化变质，工人需要另起炉灶，重建独立自主的工人组织。这包括争取组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让工人在工作场所和行业中有集体发声的工具；也包括培养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地下组织形态把先进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正如革命左翼评论指出的：无产阶级要反抗资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唯一的道路就是将自己组织起来。组织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唯一武器，有了组织，分散的个人才能凝聚成摧毁旧世界的强大力量。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样的，没有坚强的组织，工人阶级再大的勇气和牺牲也是徒劳无功、难以为继的。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不畏艰难地承担起建立工人革命组织的重任，重走列宁当年创办政治报、秘密建党的道路。通过理论宣传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通过秘密组织串联各地斗争力量，最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革命阵线。只有这样，分散孤立的劳动者才能变成有组织的自觉阶级，才能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资本势力时拥有胜算。在推进新的工人运动过程中，必须批判并抛弃一切修正主义的影响。那些鼓吹“阶级调和”“告别革命”的论调必须遭到揭露和抵制；那些为资本剥削开脱、劝工人逆来顺受的舆论必须被唾弃。工人阶级要重新树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以此作为斗争的指针和灵魂。毛主席当年号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重提这一点依然刻不容缓。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特权等级制度的合理化，反对两极分化和官僚垄断资本对社会财富的霸占。工人阶级有权利也有必要要求重新检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纠正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政策。只有破私立公，革除特权，才能重建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当前的斗争或许十分艰巨，但工人阶级终将看到胜利的曙光。历史终归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毛主席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所以他們要革命呢”。剥削一日不除，斗争一刻不止。石家庄外卖员挥刀反抗的悲壮一幕，正提醒着千百万工友：绝不能再做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而要做挺身而起的斗士。只要工人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下团结一致，新旧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奋勇战斗，就一定能推翻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统治，重建一个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新世界！正如《国际歌》所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让我们坚定地同亿万工人站在一起，去争取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光明未来。只要敢于斗争，就一定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英国科尔宾新党成立的马列毛主义评析

英国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于2025年7月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左翼政党，暂名为“Your Party”。根据报道，这个由科尔宾与前工党左翼议员扎拉·苏尔坦纳（Zarah Sultana）等人联合发起的新党，旨在成为对执政工党的真正左翼替代选项。成立声明指出：“当政府告诉穷人没钱而给战争拨款数十亿时，体制就是不公正的”，并强调新党要“深植于社区、工会和社会运动之中”。在正式成立前，科尔宾的新党就已吸引了数十万民众签名支持，反映了当下工人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党的成立首日会议上还唱起了意大利反法西斯歌曲《Bella Ciao》，表明了某种广泛的左翼情绪。然而，新党的筹备过程中也爆发了内部矛盾：副主席苏尔坦纳因党章执行和少数社运人士被排除在外而拒绝出席成立大会首日，筹备期的派系斗争凸显了左翼阵营的分裂。

- 组织组成与目标：科尔宾及其盟友多是2024年大选后脱离工党的独立左翼议员，他们此前因支持巴勒斯坦和反对加沙战争而联合起来。他们宣布新党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可信的左翼替代方案，对标最近执政的温和派工党。该党口号强调反对战争和反对社会紧缩，主张扩大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等。这些纲领与工党当前的亲资本路线明显分歧，例如工党政府虽赢得选举但继续实施紧缩政策，而新党则公开抨击“有钱打仗、没钱救穷人”的不公。科尔宾长期以来反对美国领导的战争，并在党内倡导反战立场，此次新党政策继续延续这一方向，公开支持巴勒斯坦权利，体现出明显的反帝国主义色彩。
- 群众基础与社会反响：新党成立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社会关注。在成立前就有数十万民众签名支持这一政党，反映出工人群众对现有两党体制的不满仍在延续。新党筹备会议在利物浦举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人士参加，并将意大利的抗战民谣引入大会，显示其试图与国际反法西斯传统接轨。舆论普遍认为，新党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左翼出现了新可能，但也警示斗争还未走向实质转变。官方媒体和资深评论员指出，新党成立暴露出劳工运动内部的裂痕，而科尔宾曾在执政工党中声援巴勒斯坦、批判资本主义全球战争的立场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资本主义战争机器的批判性认同。



然而，新党内部也存在诸多矛盾：例如创始人之一苏尔坦纳公开与党内其他派别发生冲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盟友被新党以“党内外其他政党成员”之由拒绝入党。此外，资金分配也出现争议：部分领导人指控苏尔坦纳私扣大量捐款，说明新党尚不成熟。

积极方面：坚持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立场

科尔宾新党较之现有工党当局，确实更加突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和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在工党多年执政期间，劳工政府多被批评走上亲资路线，与大企业和金融集团关系密切、新自由主义色彩加重。而科尔宾及其盟友则在公开场合多次谴责这种路线：他们强调财政政策应优先照顾劳苦大众而非军事开支（“没有钱给穷人却有数十亿拨给战争”），这显然挑战了当前主流政党对国家资源分配的合法化。这种立场体现出左翼的反战精神和反紧缩经济主张——反对削减公共服务、反对工资压制、支持加强社会福利。成立大会的声明还提出新党要深植于社区和工会运动之中，表明他们重视动员基层群众力量，而不是依赖传统精英路线。这些都与科尔宾过去在工党内部倡导的医疗、教育与工人权利等立场一脉相承，肯定了他“背离工党新右派取向”的倾向。可以说，新党至少在口号与纲领上重申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左翼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经济不公。这些立场与当今世界各地要求和平与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对现状不满的呼声。

严重短板：修正主义与议会道路的局限

然而，科尔宾新党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缺陷，未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首先，新党仍然坚信议会民主和选举斗争，这在马列毛主义眼中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正如列宁所指出：“对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幻想”是改良主义者的表现，认为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律框架下解决根本矛盾是幼稚的。科尔宾新党的策划者虽然口头激进，但从目前公开的动态看，他们仍企图在现有体制内运作，没有明确提出超越议会途径的路线。列宁曾告诫，无产阶级只能把改良看作“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而“决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如果新党在议会制度框架内求存，最终只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或消解，这一点历史经验早已有众多证明。

其次，科尔宾的新党在战略上带有妥协色彩，缺乏彻底的革命性。据评论指出，当年科尔宾执政工党时，他不敢撼动右派议员，未能动员群众来摒弃工党内部资产阶级代言人，以致最终被右派、资本势力联手击败。显然，新党领导层并未吸取这一教训。举例来说，在他领导下的第一次工党运动失败时，就没有清算与资本妥协的修正主义政策。如今新党组建之际，也并未公开反思修正主义（即党内亲资本路线）对运动的破坏性影响，不敢直面那些曾经推行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路线。

这种“留恋与资产阶级接头”的倾向，使得新党至今仍然游离于真正的革命线之外。正如毛泽东所批判的：

“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如果新党不揭露和决裂修正主义，只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打转，那么它所倡导的改革终将沦为对旧制度的温和修补，而非摆脱压迫的根本出路。

再次，新党的政策主张停留在社会民主层面，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目前公开信息显示，他们关注医疗、住房等改良议题，但对“消灭资本主义、让工人阶级掌权”这样的根本任务语焉不详。正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修正主义分析所说，如果领导者不明确表态要夺取政权、改造国家机器，新党极可能走上与前述改革派领导人相似的道路——在出现社会危机时与官僚层妥协，而不是发动群众的彻底斗争（列宁曾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提议罢工或武装起义，也不能掩盖其修正主义本质，其目的只是向旧政府施压以求有限妥协）。总之，新党的路线在阶级斗争方向上含糊其辞，没有提出任何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根本挑战方案。这种“妥协式社会民主路线”在毛主义者看来不足以推动社会根本变革。

马列毛主义观点：根本出路在于革命先锋队

按照马列毛主义理论，只有建立一个真正马列毛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引导英国实现社会转型。议会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高级形式，无法根除阶级压迫。列宁曾警告：“最后的抉择：要么‘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要么自己被粉碎；……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对资产阶级宪制的]这些幻想”。这表明，当代左翼若只依赖选票或议会谈判，就等于是自缚手脚。相反，应当进行不断的阶级斗争，引导群众开展革命实践。毛主席也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修正主义是对共产主义最根本原则的歪曲。新党需要认识到：只有彻底反帝反修，进行直接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才能破除资本主义锁链。

此外，帝国主义体系的压迫性决定了英国工人不能寄希望于现行体制改革。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特点是列强通过战争和殖民扩张来掠夺世界各地。毛主席也指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意味着，只要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中心存在，其政府就不可能彻底放弃对外侵略和对内阶级剥削。



英国工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而不是寄希望于庸常政客的施舍。建立坚强的马列毛主义政党，牢记国际主义精神，将反对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体被压迫民族结合起来，才是持久斗争的出路。如此革命政党方能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领导人民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

结语：团结奋斗，建设真正革命的共产党

当前英国左翼力量分散、路线纷纭，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正在成长却缺乏明确方向。在这样的局面下，广大工人阶级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国内外形势：温和派路线既已失败，单纯依赖选票和改良主义无法救国。正如毛主席所说，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需防范资本主义复辟。当下最紧要的任务，是团结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围绕一个彻底革命的纲领把力量凝聚起来。科尔宾新党虽然提出了一些进步口号，但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英国工人阶级应当发扬阶级斗争精神，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一切改良主义路线，毫不动摇地推进革命斗争。只有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共产党，才能把英国工人从帝国主义压迫和资本主义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为全社会带来根本性变革。

小资产阶级性——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剖析

引子：一撮人的两面镜子

小资产阶级像是一面薄薄的镜子，映出社会的矛盾、个体的焦虑与理想的碎片。它既能照见被压迫的正义，又会反射出自保的狭隘；既能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也会在关键时刻选择妥协。要理解小资产阶级性，必须把目光放回经济根源——把眼睛贴近田间作坊、摊贩小店和写字楼的租金账本，才能看清他们的思想肌理。

一、阶级基础：小生产与阶级位置的摇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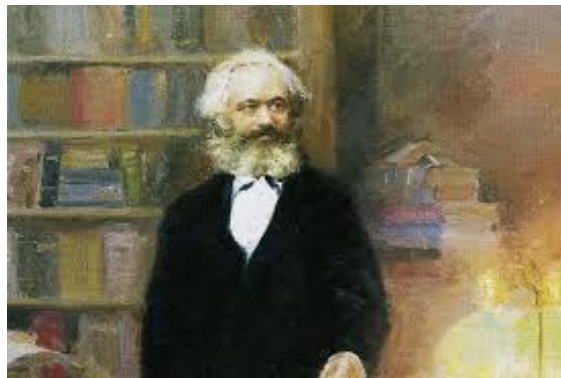
小资产阶级由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农、小业主、自由职业者与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其共同点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性与生产规模的有限性：他们既不像大资产阶级那样能掌控市场与雇佣大量工资劳动者，也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完全依靠卖劳动力为生。正因为经济上的“夹缝”，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呈现出极强的流动性与易碎性：在资本扩张、市场危机或债务压力下，许多小业主会被资本吞并或被降入无产阶级队伍；反过来，在表面繁荣期，新的小资产阶级又会不断产生。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小资产阶级常常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摇摆——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位置决定的现实。列宁、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正确理解并区别不同小资产阶级成分，是革命策略的前提。把这一点弄清楚，就能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真正的敌人，同时不放弃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

二、意识形态根源：小生产逻辑如何塑造思想

小生产决定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若干特征：

1. 自我中心的伦理与自给自足的想象：小生产者习惯于靠家庭、手艺或自我管理而维持生活，这形成了对独立性与自我负责的强烈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社会心理上演变为个人主义与对“体面生活”的执念。
2. 恐惧大潮与不信任大规模组织：对集中化、官僚化与大企业的恐惧，使得他们对任何形式的“大体系”容易持怀疑或抵触态度。这解释了为什么不少小资产阶级对国家集中、对大规模社会改造抱有天然警惕。



3. 道德化的平等观与修补式的改良主义：他们常以“公平”“良心”“人情”来评判问题，而不是以阶级利益和生产关系为轴心。于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往往偏向于补救性的、道德层面的改革，而非彻底的结构改造。

4. 双重恐惧：被资本剥夺与被无产阶级吞没：对失去自主经营能力的恐惧使得小资产阶级在危机时易于向资产阶级或反动力量靠拢，以保持现有身份；同时，他们也害怕被无产者的激进化吞没，因此在政治上呈现防御性。

这些心理与意识形态特征，在今天以消费文化、精致生活和自我实现话语表现得尤为明显。形式上是“生活方式”的选择，深层上却是阶级处境的外化。

三、政治行为的两面性与历史经验证明

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不是抽象的猜测，而是由多个历史事实反复验证的规律性：

作为革命推动力的一面：在反封建、反专制的早期阶段，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人、贫农、城市小市民）常与资产阶级联合，推动政治解放与民主改革。例如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欧洲起义中，小资产阶级力量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大体属于小生产者群体）是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革命党通过土地改革和群众动员把他们牢牢地团结在一起。

作为保守或倒向资产阶级的一面：当革命进入深水区、涉及重新分配生产资料与改变生产关系时，许多小资产阶级因担忧自身利益受损而退却或倒向资产阶级。例如1848年革命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派别，在与资产阶级的妥协中背弃无产阶级，导致革命受挫；俄国革命前后，社会革命党等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力量在关键时刻的摇摆也印证了这一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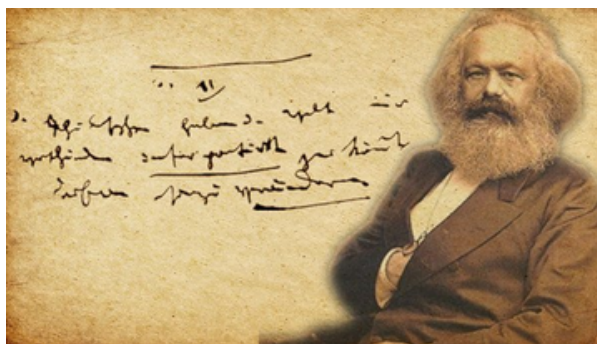
中间派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的中间立场在革命中常变为“中立”的幌子，使无产阶级与革命力量面临两面夹击：既要争取他们，又要防止他们成为反动的支点。这就是为什么列宁与毛一直强调对小资产阶级实行“争取—教育—斗争”的策略：既不放弃争取，又不纵容偏离革命路线的倾向。

四、典型历史剖析（更细致的案例）

1. 巴黎公社与小资产阶级的短命联盟：1871年巴黎公社中，小资产阶级中的小工匠、手工业者与激进知识分子曾与无产阶级并肩，但在军队、后勤与组织纪律上缺乏持久力量，最终被镇压。公社的教训显示：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优势与集中领导，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难以维持。

2. 俄国1905—1917年的复杂图景：1905年的农民起义与工人罢工显示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潜力；但1917年二月后，某些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派屡次与资产阶级妥协，错过了继续革命的机会。布尔什维克能最终胜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把农民问题放在纲领中心，提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吸引贫农这一小生产阶层。

3. 中国革命的经验与启示：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充分考虑了农民这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特殊性。通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群众动员，把广大贫苦农民从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中引导出来，转化为革命力量。



这一过程表明：物质利益的切实改变、切合实际的政策与长期的思想工作，才是把小资产阶级拉向革命的钥匙。

五、当代形态：新小资产阶级医症谱系

进入21世纪后，小资产阶级性出现新的表现形式，需要更新我们的分析工具：

新中产与“知识小资产阶级”：互联网、平台经济与自由职业催生了大量“轻资产”从业者——内容创作者、独立设计师、小微创业者。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倾向自主、在政治态度上则容易表现出“平台自由主义”与“身份优先”的话语。这类群体既不是传统的雇佣工人，也非传统的资本家，其政治动向不稳定，但在消费文化与文化话语领域影响力巨大。

消费主义和情绪政治：小资产阶级性在新媒体语境下转向情绪化与表现性消费。“生活方式政治”与“个体表达”替代了阶级团结与阶级斗争的语言，阶级问题被生活选择和心理感受所遮蔽。

城市不稳定小业主与租金焦虑：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小店主、民办工作室、短租房东等，处于资本围剿与制度不确定之间；他们对秩序与安全有强烈期待，从而在危机中易于倾向权威或保守力量。

关于真理报：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emancipationoflabour.wordpress.com/>

我们的纸飞机频道：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向者可通过官网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或者订阅我们的报纸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小资产阶级的向右漂移：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中小资产阶级在面对全球化竞争、移民压力与不确定性时，容易被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与民粹右派所动员。对此，无产阶级和左翼必须警觉：文化话语的争夺与现实利益的切实回应同样重要。

六、革命者的策略：既争取又不放松阶级斗争

面对小资产阶级性，革命者不能简单地蔑视，也不能盲目迎合。历史与阶级分析给出清晰的路线：

1. 物质政策优先：无产阶级要争取小资产阶级，先从实处下手——提供切实的经济利益保障、减轻他们的被动风险（如小微扶持、减税减负、合作化激励），但须警惕把这些作为终极目标而放弃结构性变革。

2. 思想教育与群众路线：通过长期的实践教育，把阶级分析、生产关系与历史唯物主义带进小资产阶级的日常话语中。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是空喊口号，而是把政治纲领同群众利益紧密结合，通过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建立信誉。

3. 差别化策略：不能把所有小资产阶级一概而论。对贫苦小农、手工业者要争取并帮助改造；对上层小资或民族资产阶级则应坚持斗争原则。实践中要分清朋友、可争取对象与不可调和的对手。

4. 文化与话语斗争：在新媒体时代，话语权决定政治力量。左翼需要创造能够回应小资产阶级生活关切而不背离阶级立场的文化产品：既要讲真理，也要讲情感；既要有原则，也要有温度。

5. 组织建设与制度安排：建立基层民主组织、合作社或互助网络，把小资产阶级嵌入到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群众组织中，使其在参与中体验集体力量，逐步形成与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共同体。

法西斯的印度必将被摧毁；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将胜利！——土耳其工农解放军指挥部 (TKP-ML TİKKO)

土耳其工农解放军指
挥部



2025年11月30日

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正以巨大的毅力和决心继续进行人民战争，如今他们已迈入斗争的第25个年头。我们，土耳其工农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士，在此庆祝由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成立纪念日——它是印度所有受压迫的劳工、受压迫的民族和民族群体、妇女和青年，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战斗力量。我们向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所有战士和指挥部门致以我们最诚挚的革命敬礼。

那面在森林深处、山峰之巅、南亚屋脊上飘扬的红旗，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在印度革命的伟大领袖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领导下，伴随纳萨尔巴里起义而发起的人民战争，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艰难的道路和曲折的历程，走到了今天。

我们知道，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印度革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高举着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红旗。人民战争的斗争损失了数千名战士、党员和干部。然而，它从未放弃继续革命战争的决心。正因如此，它又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战士、党员和干部。这成为了印度人民、受压迫的达利特人（Dalits）和阿迪瓦西人（Adivasis）的希望。

今天，印度的人民战争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政权加紧了对印度人民的攻击。在一场被称为“卡加尔行动”的屠杀阴谋中，85万警察、突击队、印度陆军和空军人员被动员起来，作为这次行动的一部分，对人民解放游击军力量进行围剿。“卡加尔行动”的目的很明确。他们计划包围并摧毁游击队力量。

面对法西斯的“卡加尔战争”，印度人民的儿女、人民解放游击军的英勇战士和指挥员，正以他们发展出的英雄抵抗、决心和反击来回应。在这场战争中，去年有320名同志殉道，其中包括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巴萨瓦拉吉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地区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员。最近，我们得知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员之一的马德维·希德玛同志（Comrade Madvi Hidma）被解除武装后俘虏并遭到残忍谋杀。毫无疑问，过去一年遭受的损失是沉重的，就其后果而言，是无法弥补的。

无论损失多么沉重，代价多么高昂，我们知道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转动。所遭受的损失充其量只会是印度革命胜利大道上的一个小弯道，永远无法阻止革命的前进。

那些吃着人民的粮食却背叛了人民解放希望的人，那些将人民和革命的武器投降给法西斯印度政府的人，以及那些鼓吹不光彩生活的人——索努-萨蒂什集团——也将在历史上占据他们被诅咒的位置。当印度人民自己的儿女正在英勇战斗和光荣牺牲时，法西斯印度的统治者所拍摄的那张照片，印度工人和农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根据历史的辩证发展，一边展示着英雄主义和光荣抵抗，而另一边却是恐惧和沮丧的绝望。索努-萨蒂什这个叛徒集团，将在其懦弱的重压下，在羞耻中度过余生。我们毫不怀疑，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光明道路将战胜这个叛徒集团试图在革命队伍中制造的意识形态混乱。

当帝国主义及其各地的合作政府准备新的瓜分战争时，人民的武装起义和人民战争将在其所在之地斩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锁链——而这就会是帝国主义最大的恐惧。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及其控制下的政府，在为军备划拨巨额预算并利用发展中的技术生产更致命武器的同时，发动着大规模的攻击浪潮，以解除全世界工人、农民和被压迫人民的武装。

正如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论联合政府》）帝国主义正企图剥夺被压迫者自己的解放军队，并剥夺他们使用武力的权利。但这些努力是徒劳的。

当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所有带有调和路线的左翼运动声称“武装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加速其意识形态上的攻击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像对待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一样，正在开展破坏和种族灭绝的活动。“卡加尔行动”是这场在全球展开的攻击活动的一部分。而对这场攻击活动的回应将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抵抗。

鉴于这些，我们庆祝我们的姐妹军队——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下充满决心地战斗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斗争的第25个年头，我们重申：绝对的胜利将属于印度工人与农民，而印度法西斯主义将无法逃脱那个等待着他们的既定的命运——灭亡。

巴萨瓦拉吉同志、马德维·希德玛同志和印度人民战争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万岁！
人民解放游击军万岁！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万岁！

——土耳其工农解放军指挥部（TKP-ML TİKKO）

来源：“云水怒”小组翻译

<https://t.me/Yunshuinu/90>

菲律宾青年和学生再次举行反腐败抗议

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

青年和学生团体于11月21日再次举行了全国协调一致的反对腐败的抗议和罢课活动。他们游行至马尼拉的门迪奥拉，并在大马尼拉地区的许多城市以及其他八个城市和省份举行了地方活动。这些行动是“人民反腐败运动”（Kilusang Bayan Kontra Kurakot, KBKK）每周“黑色星期五抗议”的一部分。

“青年反腐败愤怒联盟”（Youth Rage Against Corruption, YRAC）领导了1500名青年在门迪奥拉的游行。来自菲律宾大学、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德拉萨大学、圣托马斯大学、远东大学、东方大学、国家大学和亚当森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抗议活动。隶属于“一塔夫特”、“一大学区”和“一内城区”联盟的团体也参与其中。

青年在门迪奥拉的主要呼声是：“马科斯、杜特尔特，辞职！”青年反腐败愤怒联盟（YRAC）的一位领袖蒂芙尼·布里兰特（Tiffany Brillante）表示：“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不断让我们绕圈子，以避免牵涉到他们自己策划的腐败中。人民受够了统治王朝，所以他们必须下台。”

青年反腐败愤怒联盟11月21日在门迪奥拉的抗议活动标志着他们第三次由青年领导的游行。此前，他们于10月17日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行动，随后于11月17日举行了国际学生日抗议活动。

青年反腐败愤怒联盟谴责了马科斯试图恐吓青年以阻止他们行动的企图。布里兰特说：“尽管有诉讼威胁，我们要求辞职的要求不会停止。一旦他们被青年的愤怒完全吞噬，小马科斯和萨拉·杜特尔特才应该感到害怕。”

在马尼拉以外，青年反腐败愤怒联盟的盟友团体在邦板牙、黎刹、卡维特、八打雁、奎松，以及内湖省的卡兰巴和洛斯巴尼奥斯，还有塔克洛班市和达沃市举行了抗议活动。

青年反腐败愤怒联盟将重新加入由“人民反腐败运动”（KBKK）领导的11月30日黎刹公园的人民抗议活动。在“黎刹公园洪水2.0”（Baha sa Luneta 2.0）活动中，“人民反腐败运动”将要求追究所有卷入马科斯政权腐败事件的人的责任。

“人民反腐败运动”在谈到这次抗议时宣称：“从‘追究腐败分子责任’的简单呼吁，到‘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和萨拉·杜特尔特辞职’以及‘彻底改革腐烂的政府体系’的更深层次要求，所有人民的合法诉求都有空间，并且必须被听见。”



来源：“菲律宾革命网络中心”网站

<https://philippinerevolution.nu/angbayan/youth-and-students-hold-anew-anti-corruption-protests/>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德国
K·马克思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断时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导师语录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